

民國七十一年五月

韓愈傳記
資料之七

韓愈交遊與交互影響

精 二 冊 美 金 三 十 一 元

發行人

： 朱

傳

譽

兼主編

出版者：天

一

出

版

社

社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六號三樓

電話：三〇一二八七三

郵撥：一

〇

一

二

四

七

信箱：七

二

一

二

九

號

登記證：新聞局版台業字第〇〇五一號

中國文學名著欣賞

第十五章 韓愈與柳宗元

姜伯純

杜甫死後，唐詩又分了兩派。在盛唐時，高岑和王孟兩派之長統集於李白一身，到了中唐，恰恰相反，杜甫一人之長却分散在元白和孟韓兩派身上。專門繼承杜甫在內容上表現民間疾苦的作風的是元稹和白居易，他們因此揚杜抑李，爲了許多反映現實的樂府詩，更提出「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的文學理論。李紳和張籍也都屬於這一派。但是元稹的〔連昌宮詞〕〔三遣悲懷〕和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雖不反映現實，却更爲人所傳誦。而專門繼承杜甫在形式上注重格律技巧作風的是孟郊和韓愈，而以韓愈爲著名。他們並不貶抑李白，但却極推崇杜甫對格律的講求，因此專致力於字句的推敲，用奇詞而押險韻，想效法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態度。賈島、盧仝、李賀、馬異等人也都屬於這一派。孟郊的〔游子吟〕、韓愈的〔山石〕、賈島的〔尋隱者不遇〕，都是極有名的作品。這兩派的好作品雖然也不少，可是都有所偏：元白詩有平淺庸俗之譏，孟韓詩有奇險怪僻之病，終於無人能及得上杜甫。

二

韓愈，字退之，祖籍河北昌黎，先世移居河南修武縣。幼極孤苦，賴嫂鄭氏撫養成人，雖刻苦，却能知自學，在少年時代已盡讀六經諸子之書。二十五歲舉進士，初曾依藩鎮方面大員做推官，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以事貶山陽令，改江陵法曹參軍。憲宗朝，任國子博士，拜河南令，轉史館修撰，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元和十三年，因上表諫迎佛骨事，幾處死刑，後貶潮州刺史。穆宗朝，召爲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叛變，他不顧危險，隻身前往宣撫，亂遂平，以功轉吏部侍郎，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死諡文公，追贈禮部尚書。韓愈爲人耿直，情誼深厚，尤喜提携同輩，獎勵後進。〔舊唐書〕本傳說他：「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頗能誘勸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他這種胸懷和態度，對於他以後作爲一個文學運動的領導者說來，是非常有必要的。

韓愈在中國文學史上之所以佔有一席崇高的地位，不僅由於他的詩，更由於他的散文。他不僅是中唐詩壇的一位領袖人物，同時更是散文復古運動的領導者，而且他的文名遠遠過於他的詩名。現在先說說他的詩。

韓愈詩的特點是以散文的句調入詩，以作散文的方法作詩，這是一種新的嘗試。例如在〔符讀書城南〕這一首中有下列各句：「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動乃有，不動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圖。」但是這樣的詩能不能算好呢？當然不能。如果這樣，就只能算有韻的散文罷了。他的本領當然不止於此，像前面所說的〔山石〕一首，清新雄俊，通順流暢，而不一味標新立異，一方面眞樸而不華，一方面拗健而不平，這才是眞正韓詩的好處：

「山石聲磳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牀拂席置羹飯，疎糲亦足飽我饑。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烟霏。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踏澗石，水聲激激風生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拘束爲人羈？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下面再談談他在散文方面的貢獻。

〔序〕自從魏晉南北朝駢體文興盛起來以後，先秦諸子和兩漢史家的散文優良傳統，已經無形中

斷。無論敘事、說理、寫景、抒情，凡應該以散文表達的題材，都代之以排偶綺麗的駢四偶六的文體。這種文體的特色，是外形極美而內容空洞，有時更因受了對偶聲律的束縛限制，縱有豐富的内容也不能充分表達。所以到了駢體文的末流，已經弊病百出。但從唐初一直到開元天寶，仍在沿用這種文體，以靡麗爲尚，像初唐四傑就是；雖然先後有人提出反對，主張恢復兩漢以前的散文，像陳子昂、元結、獨孤及、蕭穎士、李華、梁肅、柳冕等人，都曾試着變駢文爲散文，倡導改革文體，但都因限於才力，始終未能掀起一個廣泛的運動，以致影響不大，並無損於駢體文的流行。直至中唐的韓愈出來，他以天縱的奇才，湛深的修養，傾全力從事散文復古運動的進行，結果這一運動才達到勝利成功，使散文恢復了文學正統的地位。從此經過宋元明清直至新文學運動的前夕，千餘年來，以散文名家的文學作家代有其人，產生的散文傑作也非常豐富，影響不可謂不大。所以韓愈被後世尊爲文起八代之衰的散文宗師，位列唐宋古文八大家的首席。

毫無疑問地，韓愈是唐代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也是司馬遷以後最傑出的散文家。他的學術思想是尊儒排佛，他的文學觀念則是反駢重散。所以他極不滿意六朝以來的學術空氣與華麗無實的文風。他主張思想要回到古代的儒家，文體也回到那些樸實的散體。他對文章復古的主張，散見於下列文字中：

「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後）

「讀書以爲學，續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闢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

（送陳秀才彤序）

「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謏乎其難哉。」

（答李翊書）

「惟古於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往堅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踴。」

（南陽樊紹述墓志銘）

從這些話裏，可以知道韓愈的主張，不外三點：一、反對六朝的駢儷文體，而用三代、兩漢的散文體。二、爲道而學文，爲道而作文；文學不能離開道而獨立，文學技巧也僅爲表現道而存

在「所謂『道』」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的大道，以此作為文章的內容，以矯正當時綺麗文風的弊病。三、陳言務去，言必己出。

韓愈不僅宣傳他的理論，更重要的是創作了許多優秀的散文。他雖號召復古，實際他的散文則為革新。在古代散文的基礎上，創造發展，形成一種富於邏輯性與規範性的文體。這種文體，宜於說理、敘事、言情，成為中古以來最流行的切合實用的散文形式，就是對於當代的傳奇文學，也起了重大的影響。他主張作文「言必己出」，「務去陳言」，反對剽竊，強調語言的創造性，這都是很有意義的。在他的散文裏，廣泛地反映出當代中下層讀書人被壓迫的悲哀和鬱鬱不平的情感，以及對於佛老思想的反抗。至於他講到散文的表現方法，主張創造、主張新奇、主張氣勢，這是很寶貴的見解，所以他的散文作品，雖然思想內容是「明」儒家的「道」，而文章的面目和體制，却是全出新意，遺詞造句，從不依傍古人，尤以氣勢磅礴，才情洋溢，形成他獨有的風格，而為後世所取法。他在散文方面的代表作品有：〔原毀〕、〔師說〕、〔馬說〕、〔畫記〕、〔張中丞傳後敘〕、〔柳子厚墓誌銘〕、〔送孟東野序〕、〔送李愿歸盤谷序〕、〔毛穎傳〕及〔祭十二郎文〕等。

韓愈的散文復古運動之所以能够獲得成功，不只在他能提出具體的理論和寫出高明的作品，還在他能拉攏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後輩，共同從事這一運動。他的朋友中最為得力的便是和他

齊名的柳宗元。

三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少時精敏絕倫，善爲文章，爲時人所推重。貞元初舉進士，後爲監察御史。順宗時，柳宗元參加王叔文的政治集團，後因失敗，貶永州司馬。柳宗元是一個剛正不阿、好事喜功的人，加上少年英銳之氣不能自掩，所以遭忌之者號爲「狂疏輕薄」（見與楊諱之書）。及遭貶謫後，遂廢然不振。居永州十年，司馬末職，無事可爲，便以讀書著述及遊山玩水自遣，於是文名益盛。「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繼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韓愈柳子厚墓誌銘）不久，遷柳州刺史，死於柳州。（新唐書·本傳）說他：「既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煙危感鬱，一寓諸文，做（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柳宗元這種悲苦的境遇，對於他的文學成就，自有很大的影響。

柳宗元是韓愈古文運動有力的支持者、宣傳者。韓立論過於重道，柳則較爲重文，然在文體的反駁文與重散體這一點上，他倆却是一致的。柳本好佛，雖然論文章也主宗經，但他的思想範圍已較韓愈爲廣泛，爲深厚。他雖一再以「明道」爲言，但他對於道的解釋，較韓愈所說的要廣泛得多。他覺得一方面要在古書裏求聖人之道，同時又要求其辭。求諸辭而遺其道固然不可，只

求諸道而遺其辭，也是不可。柳宗元的道，一是古人所講的道德的道，一是古人作文的藝術之道。因此，他雖與韓愈並稱「韓柳」，但文章却有相當的差別。就文體而論，韓愈極力摒棄駢偶排偶，求其文從字順；甚至不惜矯枉過正，使文句佶屈聱牙。即使莊嚴肅穆之作如〔平淮西碑〕之類，也能出奇制勝。而宗元雖也反對駢偶文，但並不像韓愈這樣趨於極端。再就風格而論，韓文雄厚奇崛，議論奔放，他的〔祭田橫墓〕、〔張中丞傳後敘〕、〔後廿九日復上書〕、〔靈記〕等篇最能代表這種風格。柳文則雅健峻深；雅健者如〔封建論〕、〔段太尉軼事〕等，峻深者則在永州、柳州所作之山水遊記屬之。

柳宗元的傑出作品，都產生在貶謫以後。由於他深入社會，接近民衆，在他的作品裏，反映了窮苦民衆的生活感情。他的作品首先便我們注意的，是他的寓言。這些寓言大都是寫動物故事，短小警策，意味深遠，含著犀利，富於諷刺文學的特色。如〔三戒〕、〔熊說〕、〔蝥蟪傳〕等作，都有深刻的教育作用和寫實意義。例如〔蝥蟪傳〕：

「蝥蟪者，善負小蟲也。行過物，輒持取，印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墮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

者，過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急而黷也，黷棄之，遠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在這篇短文裏，以簡鍊的文筆，將貪婪成性的人的本質，作了辛辣的諷刺。令人讀了，感到意味深厚。

寓言以外，柳宗元的短篇傳記是非常優秀的。這些短篇傳記，不是取材上層社會的英雄人物，而是描寫一些市井細民。〔宋清傳〕〔種樹郭橐駝傳〕〔童區寄傳〕〔捕蛇者說〕等篇，是他這方面的代表作。

此外柳宗元的山水遊記，描寫精澈，意味雋永，是前人一致稱讚的。他的山水遊記有兩個特色：一，他不是客觀的爲了欣賞山水而寫山水，而是把自己的生活遭遇和悲憤的感情，寄託到山水裏面去，使山水人格化感情化，因此在他的山水文裏，仍然反映出作者在其他散文中一貫的思想內容；其次，他在山水的描寫上，有細微的觀察與深切的體驗，運用最精鍊的筆觸，清麗的語言，以作詩之法作山水遊記，把山水的真實面貌，刻劃出來，形象生動，色澤鮮明，詩情畫意，

宛然在目，成爲山水散文的傑作。

散文以外，柳宗元也是優秀的詩人。他的詩正如他的散文一樣，反對庸俗與華麗，保持他的清麗明秀的特色。像〔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

「宦情竊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

以及「泉廻淺石依高柳，逕轉垂藤間綠筠」（過盧少尹郊居）；「兼假漸瀝含秋霧，橘柚玲瓏透夕陽」（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等，都是精瑩如珠玉似的，與韓愈詩之大氣包舉，萬象森列者大不相同。他的詩以自然詩歌爲著名，有名的作品大都寫於被貶謫之後，如：

「古道饒蕪藝，蒼迴古城曲。攀花被堤岸，飲水寒更淥。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疎，霜重梨棗熟。行人迷去住，野馬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無厭饌與粥。」（田家三首之三）

「稍稍兩侵竹，翩翩鶴驚羣。美人隔湘浦，一夕生秋風。積露香難極，淪

波浩無窮。相思豈云遠，卽席莫與同。若人抱奇音，朱絃離枯桐。清商激西顙，泛灩波長空。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希聲闕大樸，雙俗何由聰？」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江雪）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漁翁）

首篇詠農村生活，澹遠閑雅，極似陶淵明。次篇寫山水景物，刻劃雕琢，有類謝靈運。唐代自然詩人中，兼有陶、謝兩家詩風者，以孟浩然與柳宗元爲最著名。

柳宗元之田園山水詩，怡悅閒澹，而無類廢悲觀心情的表現，頗不像是一個被貶謫的逐臣所作。究其原因，一由於他性愛佛理，頗能看穿世事。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說道：「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再則因不敢觸動創傷，故意避而不談，有時反強顏歡笑，裝出怡然自得之情。但宗元憂憤鬱結之氣，仍不時衝破理性的藩籬而求宣洩；像這等真情流露的作品，多爲寄贈他至親好友者。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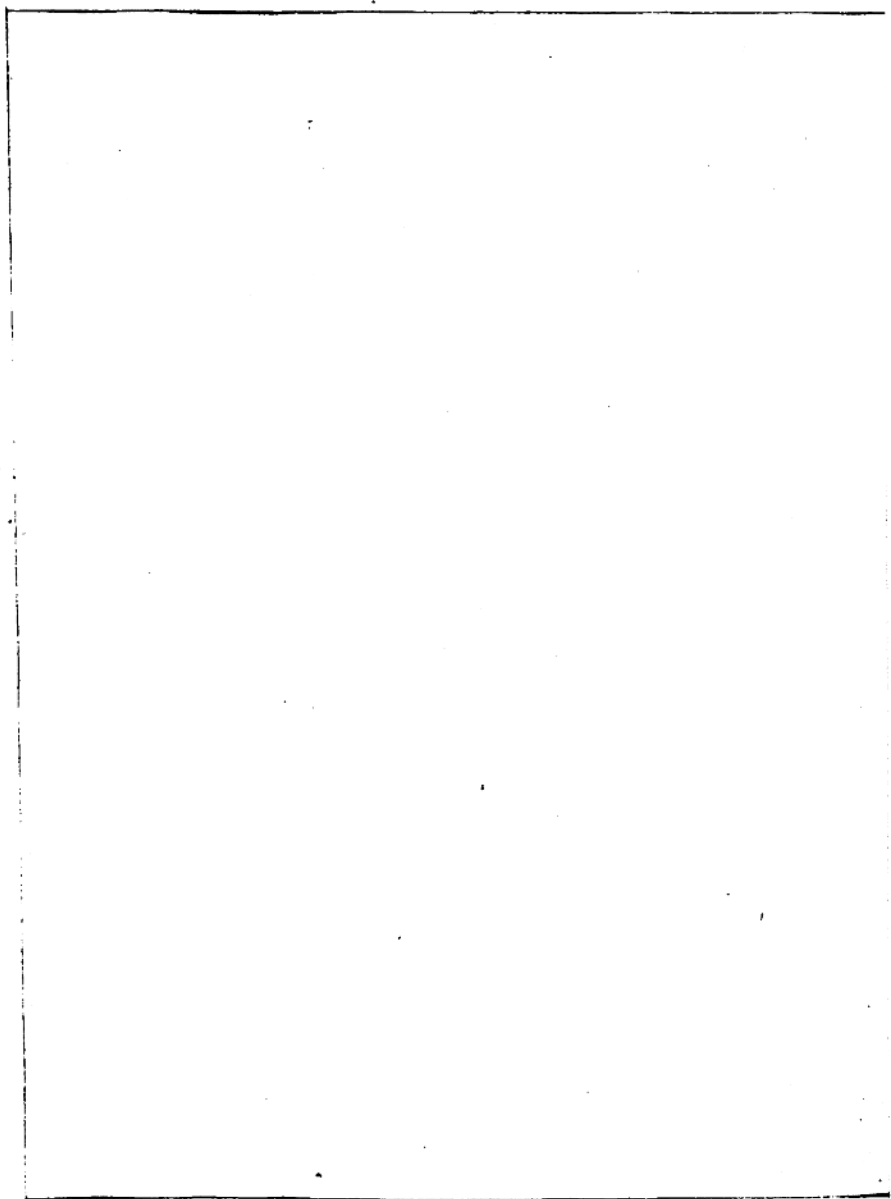
「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爲嶺外行。伏波故道風煙在，翁仲遺墟草樹平。直以慵疎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

「零落殘紅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煙。」

（別舍弟宗一）

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歌，令人讀了特覺酸楚。



論杜甫與韓愈

胡秋原

儒服弊於地。學者淪素志。周室宣中興，孔門未應棄。

高歌激宇宙，凡百俱失墜。——杜甫

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韓愈

本國文學的教育和研究，是一個民族的最基本教養；而國家和社會的獎勵，乃所以顯示成就和模範。

自張義軍先生指出中山學術獎金的得獎者之一即是抗戰時期日本特務機關徵文的得獎者之事實以後，教育界文化界立法院紛紛提出批評和質問。大家的意思顯然不是要對得獎者之過去追問法律責任，因為此在時效上為法律所不追；而是要問過去得獎者及其著作現在應否得獎。

這事實非大家所知（過去得獎者已經改了名字），現在既有人指出，亦關大義與公器，有關方面自應該有一種認真檢討。如果那得獎者承認過去文字之不是，而中山獎金會也能承認事屬疏失，則這可說是一件小事，應該過去了。然而那得獎者還「大言炎炎」，說他的「日本文化與支那文化」是「高瞻遠矚」，共同黨還要打人罵人，而獎金董事會認為他們的獎

辦得周密，獎得公平正當，還有「輿論」說「文學十家傳」如何有學術價值，說批評的人抱「個人恩怨」，逞「乖戾之氣」；這便是很嚴重之事了。

嚴重之點，還不在那得日寇特獎者又可得中山獎，成為永恒得獎者；而在這一事實：即主持國柄者又是主持文柄者，而其知識之貧乏與其對民族大義之冷淡相平行；其對邪妄之愛好與其對公意之藐視相對照。

這不僅是國家禍患之由來，也是將來危險之所在。

基於本誌之根本主張，由於本誌首先刊載張義軍先生文章之一種責任，鑒於此一問題所包含的重大性質，我想一談有關問題，並期望文教界人士能有一個自任的運動。

「日本文化與支那文化」作者至今還無改好意

近百餘年間，中國曾受歐洲列強侵略。日本原亦受侵略，但後來學得西洋餘技，居然想滅中國。日本是靠中國文化而開化的。所以日本對中國之侵略也就是一種叛逆。而中國人還要依附當時敵國害其本國，則可說是逆中之逆。而「日本文化與支那文化」之作者竟基於否定支那文化崇拜日本文化之主張而擁護日本屠殺國人之戰爭，實可謂逆中之大逆。

他居然寫信給我，在那信中，既無稱呼，且自言自斷，說我打電話給他，說我「不喜歡有人談國事」，還要我忠告徐復觀「自己站起來」。這是無禮、誣詐而妄誕。此不值計較，我亦已略為答覆，無須再談。不過他還對我大言，說那戰時日本懸賞論文集有歐美印度人文章，而審查人員「全是知名世界第一流學者」，並以其日本老師稱其「高瞻遠矚得未曾有」自豪，又說他們算